

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观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的逻辑建构与当代启示

洪丽^{1,2,3}, 陆杰荣²

¹鞍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辽宁鞍山

²辽宁大学哲学学院 辽宁沈阳

³格拉斯哥大学批评研究学院 英国

【摘要】环境伦理学是探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伦理原则、规范及价值体系的知识体系，其核心在于建构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础的价值理论。本文通过梳理与阐释19世纪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观及其环境伦理思想的形上基础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环境伦理学家的环境伦理思想观点，进一步探索和分析了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观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萌芽的当代启示。爱默生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倡导构建人与自然互养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对当前环境伦理研究的深化、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推广、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环境保护实践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环境伦理

【基金项目】2019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L19BWW010)：爱默生的伦理思想及其当代精神价值研究

【收稿日期】2025年10月23日 **【出刊日期】**2025年11月20日 **【DOI】**10.12208/j.sdr.20250280

The logical structure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of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Emerson's transcendentalist view of nature

Li Hong^{1,2,3}, Jierong Lu²

¹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nshan, Liaoning

²School of Philosophy,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³School of Crit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Glasgow, United Kingdom

【Abstract】 Environmental ethics is an academic field that examines the ethical principles, norms, and value systems gov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with its core focus on constructing a value theory grounded in this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Emerson's transcendentalist view of nature and its embedded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the 19th century, while also incorporating key perspectives from representative Western environmental ethicists, particularly th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further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the incipient environmental ethical thought within Emerson's transcendentalist framework. The study reveals that Emerson's philosophy emphasizes the intrinsic unit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dvocat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life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nourishment and symbiosis. This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deepening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ethics research, promoting the preservation of natural ecosystems, reconstructing harmonious human-nature relations, advancing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practices, and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Emerson; Transcendentalism; Nature; Environmental ethics

作者简介：洪丽（1981-）女，满族，辽宁鞍山人，鞍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辽宁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外语教育和跨文化交际研究；陆杰荣（1957-）男，汉族，辽宁大连人，哲学博士，辽宁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形而上学理论研究。

从19世纪中期起,受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和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影响,面对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和人们对物质生活追求无止境的泛滥,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打破了平衡。美国一批人文自然学者如爱德华兹、爱默生、梭罗、利奥波尔德、约翰·缪尔、罗尔斯顿等成为现代环境主义的先驱,批判和反思了当时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引发了多次环境保护运动的浪潮,直接推动了美国环境伦理学的萌芽和发展。美国是西方环境伦理学发展较早和较为成熟的国家之一,美国环境伦理学代表着当今西方环境伦理学发展的最高水平。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建立根源于对环境危机的深刻反省,也得益于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精神资源的深入挖掘。环境伦理思想这一全新的知识体系的形成,不仅从理论层面为西方国家愈演愈烈的环境运动提供了科学指引,同时也不断提升了民众的环保意识和行为积极性。本文意在分析西方环境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环境伦理学家的环境伦理思想观点,进一步探索和分析了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观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萌芽的当代启示,阐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内在的统一,建构起人与自然互养相生的命运共同体,“让道德在地球上发挥作用”^[1]。

1 西方环境伦理的形而上基础

西方环境伦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思考和内在省察。就环境伦理产生的外部因素而言,环境伦理在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环境伦理于上世纪至今逐步发展起来,越来越体系化、脉络化,逐步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支点。从环境伦理起源和发展的内因而言,人与自然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背景之下,矛盾愈发凸显,环境伦理是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反思和内省,是人们对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产生的怀疑和叩问。就环境伦理观念与传统伦理观念的差异而言,环境伦理的对象是对象化的、客观化的自然环境,是与人类的活动方式和表达方式完全不同的物化自然。在人对自然进行改造的实践活动中,自然的往往是最为被动的,甚至是无力反抗、无法挣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都能够取得圆满成功,自然环境往往在多年以后让人类为当初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1 西方环境伦理的理论内涵与前提

西方环境伦理是现代环境哲学的形而上在对

当代哲学的理解。环境伦理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人类道德的进步,它不仅扩展了道德关怀的范畴,将自然环境纳入伦理考量的对象,也深化了道德的内在涵义。这一理论创新既丰富了伦理体系的内容,也为人类指明了一条通过自我完善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径^[2]。它是在今天的伦理学的人与自然现实的理解和人与自然性的核心层次来提出的,是新的哲学环境及现实的西方国家伦理的新的哲学概念的思想。对西方环境伦理前提的反思及其价值的重新确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环境伦理与传统伦理的差异和分野,同时也意味着从传统伦理到环境伦理的思考中,蕴含着范式的转换,环境伦理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变革,创新与发展,需要以一种较之传统范式更加富有解释力,更加富有合理性的理论范式来对旧范式做出替换,这就需要为环境伦理哲学范式建立起扎实的道德形而上学根基。

1.2 西方环境伦理的道德形而上学依据

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就其内在旨趣、结构与本性的规定而言可被界定为形而上学。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外在规定体现为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第一学术”,是统摄自然哲学、实践伦理与技艺创造的“最高智慧”,亦为探讨知识之知识的“普遍学问”。作为第一哲学,形而上学对一切存在者均为真确,并构成所有论证与推理的根本基础^[3]。哲学的形而上学功能并非恒定、预成或静止不变,而是受到社会历史变迁中的精神转向、文化价值的流变以及知识型构的演进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一历史性境遇意味着,形而上学始终存在着被重新奠基的可能性^[4]。

环境伦理认为人不再是伦理道德的唯一载体和价值原则,整个自然环境都被纳入到伦理的考察范围之内。康德指出道德乃是有理性者能够作为自在目的而存在的根本条件;唯有凭借道德,他才能成为目的王国中的立法成员^[5]。这就意味着道德是依据道德理性的不依赖于经验的一般原则而建立的,它依据人类自身理性运作。道德作为“一个以存在论为基础的目的论概念”^[6]是伦理的合理性的基础。伦理本身并不必然包含道德,一种新的伦理的建立,总是需要经过先验的道德理性来对其进行反思,从而确立其道德形而上学的依据。

对于康德而言,道德形而上学是个体基于自身情况形成的一种行为准则,而环境伦理可以理解为

在保留自身立法内容的同时，加入了一个超越于人的自然维度，而且也使得人类的道德理性寻找到进一步自我完善的途径。于是，在进一步反思道德的一般原则时，就必须将自然环境作为一个先验条件纳入到道德理性建构的过程中。在康德的道德理论框架之中，道德总是以人类自身为目的，其最终目标也是道德理性的自我实现。把环境伦理置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思想路径上去加以考量，能发觉到环境伦理的必然性意义^[7]。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思想路径能够启发我们对当前思维模式与伦理建构进行反思。沿循其纯粹道德理性的逻辑推进，可以得出如下概括：在评价人与自然的互动行为时，行为的道德性不再依赖于人的经验或常识，而必须依据道德理性法则进行先验判断。这意味着，道德标准并非主观的、经验性的，而是内在于人的非经验性先验结构中的普遍规则。若从道德理性中能够推导出自然环境具有内在的善，那么环境伦理便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基础。这进而要求我们在道德理性框架内，重新为人类与自然这两个不同主体确立价值定位，并探寻与之相适应的伦理规范，从而为环境伦理体系的建构提供坚实且规范的理论支撑^[8]。

1.3 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与环境伦理学生成的内在关联

现代西方哲学、伦理学的转向是环境伦理学生成所不可或缺的人文背景与理论前提。西方环境伦理学是吸收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营养，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发展壮大起来。一般认为，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转向可概括为反形而上学、非理性主义、反主体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主要趋势。这些批判形而上学、理性中心、人类中心、二元对立、机械论以及科学至上的理论立场共同构成了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形而上学传统中，对世界本原的追寻往往指向某种超验的本质或永恒的实体，并将其视为现实世界的终极依据。当形而上学的传统受到挑战，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走向衰落也无法避免。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和随着哲学的发展理性主义的缺陷无可避免的显现出来。理性主义的危机同时也伴随着主体主义的危机。主体主义的形而上学认为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主、客二分的框架中，主体对于客体具有先在性和决定

性，主体的尺度是客体所必须服从的。基于此，主体主义的哲学思想初步确定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内涵，伴随着20世纪哲学的发展，主体主义哲学也受到了诸多思想家的抨击，他们认为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变得紧张和不和谐的因素，实际上“人的主体地位是由其共在的事物所赋予的，人的生存方式不是孤傲的存在，应当与其他事物和谐相处，即人应当成为大地的看护者，‘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9]

在当代西方哲学演进中，后现代主义转向作为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思潮，其在哲学层面的核心关切体现为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解构——此处现代性主要指启蒙传统所确立的个人自由、理性至上等核心观念。以格里芬等为代表的学者指出，现代性不仅引发人类的精神危机，亦激化了人与世界的对立关系。面对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传统，以及机械论世界观与还原论思维模式，后现代主义主张在超越现代性的基础上，推动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传统哲学中的二元论与还原论取向逐步导向自然界的“祛魅”，即自然被剥离其主体性与内在体验，沦为纯粹的客体。与此相对，整体有机论则强调人与世界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个体不仅嵌于社会网络之中，亦内在于自然整体。那种认为自然界可完全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观念，在此视角下难以成立^[10]。从后现代主义与环境伦理学的关系来看，后现代主义与环境伦理学已形成实质性的结合。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有机整体论及其关于自然的“祛魅”与“返魅”论述，与环境伦理学的核心主张密切互动，显著影响了该学科的理论建构与发展方向，并为其重要理论转折提供了关键启示。现代西方哲学中新认知范式的形成，为伦理学形态的当代转型奠定了学理基础。正是在不断吸收现代哲学思想资源的过程中，西方环境伦理学逐步得以发展与完善。

2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环境伦理的思想先驱及其自然伦理观

西方环境伦理的思想先驱及其自然伦理观构成了该领域发展的历史与逻辑起点。作为哲学的重要分支，伦理学的发展既遵循内在的学术演进规律，也深刻植根于社会现实与时代背景的变迁之中。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环境

关系的日益关注, 相关理论与实践探索逐步展开。从伦理学视角来看, 将自然环境纳入道德关系范畴, 系统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伦理关联、评价准则、基本原则及行为规范, 并着力构建一种旨在推动人与自然长期和谐共生的新型价值体系, 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石。哲学发展虽遵循其内在逻辑, 但始终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 根植于社会背景的变迁。通过梳理总结环境伦理观点学说的发展历史可知, 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该理论观点出现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已经形成的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为环境伦理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启示。

2.1 爱默生

以美国爱默生为代表的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家的思想萌芽植根于 19 世纪 30 年代兴起的超验主义运动。该运动以重新认识自然、重构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 带有浓厚的宗教哲学色彩。在爱默生的引领下, 超验主义主张人本主义哲学, 反对权威与传统教条, 倡导个性解放, 强调人能够超越感觉与理性, 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直接把握真理。爱默生不但是美国哲学和文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同时也是美国环境伦理思想萌芽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爱默生是美国环境伦理思想的奠基人。爱默生之后的环境伦理思想的实践者梭罗, 浪漫主义作家惠特曼等均受到了爱默生的作品及思想的直接影响, 而再之后美国环境伦理学的先驱约翰·缪尔、奥尔多·利奥波德以及罗尔斯顿等人也是以爱默生的环境伦理思想作为哲学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爱默生是名副其实的美国环境伦理思想的奠基人。爱默生沿袭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 认为世界包括灵魂与自然被视为一种精神性普遍存在(可理解为上帝)的流溢, 是对最高普遍实在的映现。自然与人的灵魂皆源自这一普遍精神的创造, 因此自然也作为人之精神的象征与外延, 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同构关系。要认识上帝, 人需向精神世界充分敞开自身, 开启心灵的窗口以实现与上帝的沟通。在这一过程中, 自然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11]这就是说在对自然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解读时, 必须以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系为出发点, 人的主观认知是自然价值的确认方式。“人被置于存在的中心, 从其他每一样事物中发出的启示之光都照向他。若无这些事物, 就不能理解人; 同样, 若无人, 也无法理解事物。自然史中的所

有事实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是不结果的, 就像单性的植物。但若将它与人类历史相结合, 它就充满了生命。”^[12]从这样的文字表述可以看出爱默生把人看作精神和意义的中心, 将自然精神化、道德化, 把自然的价值隶属于人的精神价值。爱默生的这些思想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 是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人类中心论。然而这与片面强调自然存在的目的要服从人类物质利益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区别仍十分显著, 同样也显著区别于梭罗的肯定自然的思想。

2.2 梭罗

在爱默生思想的影响下, 梭罗于美国独立六十九周年纪念日迁入瓦尔登湖畔自建的小屋, 以此象征其独立生活与精神探索的开端。这一行为不仅标志着他对环境保护的身体力行, 也开启了其回归自然、探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实践历程。梭罗对简朴生活的亲身实践, 为后来环境保护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参照。梭罗亲身体验了一个人在自然中独处, 实践了爱默生独自与自然为伴的超验主义伦理思想, 具有丰富的环境伦理意味。梭罗关于自然的基本思想也是超验主义的, 继承了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哲学。梭罗对于现代环境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不仅是一位细心的自然观察者, 他的深邃的自然思想成为今天环境生态伦理学的重要精神资源。梭罗的自然是实在的、具体的。它不只是在精神上服务于人的手段, 它本身就是自己存在的目的和理由。梭罗对自然的精神意义和审美意义的感悟, 他强调的自然有不依赖人的独立价值的生态中心论思想, 比较全面系统的批判了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物质主义, 是世界公认的美国环境主义先锋。梭罗认为自然是原始的、神圣的和完美的, 我们可以从自然中直接获取思想灵感和道德资源。梭罗主张我们应当放弃现代性的现实生活, 放弃那些舒适性和便利性, 归回到自然当中。体悟生命的真谛。对于梭罗来说, 自然意味着宁静、自由和幸福。美国超验主义者倡导人类对自然保持热爱、尊重和保护之情, 在确保自然良好存续的同时实现人类自身的持续发展。许多中外学者认为爱默生、梭罗的著作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环境伦理思想。菲利普·卡法罗曾如此评价梭罗: 亨利·梭罗在强有力且富有实践意义的环境伦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他指出, 梭罗是最早对人类中心主义展开系统批判

的先行者之一，至今仍被视作该立场最有力的批评者之一。梭罗的深刻意义在于他向我们昭示了一种如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实现人类繁荣与精神丰盈的生活可能^[13]。虽然梭罗并未真正提出环境伦理这一概念，但是其思想其包含了丰富的环境伦理认知。梭罗关于自然的思考为二十世纪出现的环境运动提供了科学指导，在反驳人类中心主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梭罗也成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道德象征^[14]。

2.3 约翰·缪尔

在对自然环境进行认知和表述的过程中，相关学者均采取了类似爱默生、梭罗的研究方法，在观察、体悟自然的基础上从精神层面对自然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认知和表述，形成了一种“自然观察自然”的理念。约翰·缪尔（John Muir）深受梭罗的体验自然和环境保护思想的影响，他和梭罗所倡导的自然保护主义薪火相传，为之后的环境保护运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是现代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重要精神遗产。缪尔在早期环保运动和自然文学创作中，缪尔作为时代领袖成效斐然。缪尔的自然文学创作以在美国西部地区的实地勘察和生活的经验为基础，文风自然优美，以散文和生态传记为主要类型。他对自然环境的描写极为生动，蕴含着与自然心灵对话的美妙内涵和深刻的生命哲思。这样点点滴滴的“山间哲思”给予了缪尔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终其一生缪尔共有六十本日记存世。

《加利福尼亚的山脉》（The Mountains of California, 1894）、《我们的国家公园》（Our National Parks, 1901）、《夏日走过山间》（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1911）、《优胜美地山》（The Yosemite, 1912）、《阿拉斯加游记》（Travels in Alaska, 1915）等作品被广泛传播，受到了世人的高度赞誉。缪尔倡导人们保护自然，因此，他耗时数年争取到约塞米蒂国家自然保护公园的成立，同时，他的名字被应用到冰川、森林的命名中，并亲自建立自然保护机构“塞拉俱乐部”。作为塞拉俱乐部的开创者，对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以及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他身后聚集了一代代追随者。这些是美国环保运动、环境伦理学诞生发展的基础，并对后世环保主义者产生思想上的深远影响。缪尔认为大自然并非是一种单一的物质工具，同时也能满足人类的审美、净化心灵的精神价值需求。缪尔在体验、感

悟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形成了环境伦理学的诸多观点，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和启迪，被人们称为“国家公园之父”和“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圣人”。

2.4 利奥波德

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1949）一书中系统阐述的大地伦理学，被视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的重要范式，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下生态中心论的开创者，对当代环境伦理学，特别是美国的环境伦理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他在远离都市与自然完全相融合的乡村生活之中深切地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大自然的和谐、宁静之美。在《沙乡年鉴》的“大地伦理学”一节中，利奥波德首次系统阐述了生态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学框架。他所提出的大地伦理主张将一切自然存在物乃至作为整体的大自然纳入伦理考量的范畴。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将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视为最高价值，并不直接赋予植物、动物、土壤与水等个体以道德地位，而是通过将人类定义为大地共同体的一员，从而引申出人类对该共同体的义务。利奥波德明确指出，大地伦理的任务在于扩展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使其涵盖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由它们构成的整体——大地，并将人类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转变为其中的普通成员与公民。这一转变意味着，人不仅须尊重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也须尊重共同体本身^[15]。通过倡导从生态整体性出发评价自然，大地伦理确立了一种新的价值尺度。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灵感和精神资源。

2.5 罗尔斯顿

罗尔斯顿作为一个对生态学有深入研究的著名环境伦理学家，同样是依据生态学的整体论原则，立足于生态系统的规律性和整体性，建立了自己的环境伦理学理论。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从自然主义出发，综合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提出一种“自然价值论”，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依据。罗尔斯顿也有长期亲近自然和观察自然的经历。当他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山坡上看到生长的极为茂盛的苔藓，看到“它们就在那里，不顾那些哲学家与神学家的话，也不给人带来什么好处，只是自己繁茂地生长着”的时候，罗尔斯顿感悟到，人类常以傲慢的姿态将自身视为万物的尺度，然而诸多自然存在远在人类出现之前便已存在。这个可被人类认知

与评价的世界并非缺乏价值；恰恰相反，正是这个世界本身生成了价值，在人类所能设想的范畴内，几乎没有什么比它更接近于终极实在^[16]。罗尔斯顿肯定自然的价值，认为人类必须对自然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思想的核心。他认为生态系统既是一切价值之源，也是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

如上所述，欧美的诸多环境伦理学家们敬畏生命、赞赏自然、重视大自然的美感、诗意和灵性，正向爱默生说的那样，自然之美正是人类心灵之美。自然法则也就是人类心灵的法则。强调自然规律和蕴含于自然当中的道德规律的神圣，表达了他们对自然的崇敬和热爱。他们秉持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出发点，批判冷酷的机械自然观，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从道德层面对自然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重新诠释，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反对自然被彻底物化和经济化，也反对将人类与自然关系进行对立。他们把自然看作是人类精神的避难所和医治社会存在的道德罪恶的神圣的教堂，认可在肯定自然内在价值的基础上构建起一种更加和谐的人与自然之关系，为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发生、发展、演进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和实践指导意义^[17]。

3 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观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萌芽的当代启示

3.1 对当代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启示

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观为人们全方位地开拓了精神视野，不仅使人们认识到新的人与自然关系，还对指导人们享受新的自然审美具有美学上的意义。超验主义的自然观确保自然共同体中的各个物种可以保持稳定关系。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人类也是诞生在自然中的产物，人的活动对自然环境有着明显的影响。正是这种本质关系的存在，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方式，人类活动始终会影响自然系统生态平衡。在自然规律面前，人类只能尽可能的顺应自然规律和保护自己不受自然灾害的伤害。

在爱默生的超验主义自然观中，人类沉浸到自然中的时候，自然中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人类的朋友，沉浸到自然中的人类应向自然中的一切学习。自然是人类学习“爱”的来源，只有人从内心去体会自然与生命的魅力时，人才能超越于其他物种，体现人

类的个体尊严与价值。对于自然界中的动物来说，动物天性支配它的一切行动，这是狭隘利己主义的模式和低级生命状态的存在状态。人在自然中超然万物主要是因为人可以从自然天性中的束缚摆脱出来，能实践思想意识中的利他主义，对他人与社会产生关爱之情。但是，当人类将“爱”只限定在在人的群体中发挥时，人与人间的互相爱护也仍然是属于人类的狭隘的爱而不是真正的“爱”。如果将“爱”与个人人性相融，如果把“爱”融于人的本性中，由爱己爱自然，再扩展到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就能激发个体对自然的积极态度。人类在开展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要爱护自然生命，主动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自然的利用是基于对客观规律的尊重，这样才能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保证自然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按照自己的功能与结构自然地运行。

人对自然的关爱起点，既不是主观欲望，也不是控制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保持和谐统一。不论是人对自然的支配，还是人受到自然的奴役，都属于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现象表现。只有人在实际需要时对事物内化成自己真正的爱，人与自然才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人们能够根据自然本性来探索、关爱自然的一切，人的价值也因此得以实现，这是主体自我获得完善的基本形式。弗洛姆提出，“在爱的行动中，我与万物和一。”^[18]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观的特征在于将人类的自我意识向更广大自然引申，主张人们以直觉来感悟自然真理，当人能够以自然存在物视角对整个世界进行观察时，他看到自我的同时也能看到其他事物，将人与自然间的障碍合理破除，实现相互认同并创造双向流通的路径。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的融合就是相互间达成自我实现的行为。在这个行为过程中，必须经由双方共同协商来实现。

3.2 对当代人类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启示

超验主义自然观号召人们从欲望的枷锁中摆脱出来，能在简朴生活中找到心灵的宁静。这就是个人自立精神的描述。当个体可以发挥个性时，他的创造力就会空前高涨。1845年7月4日，梭罗为实践爱默生的理论，独自一人到瓦尔登湖畔居住，实践极致简朴的生活。他将内心完全向自然敞开，记录他在瓦尔登湖畔居住两年的心灵富足的生活时光。《瓦尔登湖》出版以后，彼时处于心灵压抑状态下

的美国公众被那种美好的自然生活吸引，很快获得人们的认可。梭罗选择进入自然的时间是美国的独立日，他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向人们昭示他实践自然的决心。正是有了梭罗的实践让人们看到回归自然的可行性，人们并不需要过度丰富的物质，以最低水平的生存条件是可以在自然中获得完满的人生，这是人们获得简单独立且诗意生活的重要方式。对于梭罗来说，人类社会处于不断进步发展中，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当代人的形体构造与远古时期并没有显著不同。梭罗追求个体的精神独立，《瓦尔登湖》是他追求精神独立的宣告书。

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观与梭罗《瓦尔登湖》都启示人们从自己的迷茫人生中看到新的前进方向，让人们致力于追求精神家园的丰盈，让人们真切感受到真善美的存在。爱默生生活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当时“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这个概念并不存在。最早提出“生态学”概念的学者是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观中始终贯穿着现代生态思想理论的萌芽，也符合当代生态批评的某些观点，爱默生成为美国环保主义的先锋是无可置疑的。爱默生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使其得到思想发展的土壤。

爱默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对现代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也有很多启示。以环境伦理视角来看，爱默生作品对现代环境伦理和环保实践都有指导作用。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全球生态系统出现失衡状态，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发达国家饱受工业文明引发的环境危机问题，人们终于意识到便捷舒适的生活并不应该以环境破坏为代价。伴随着人类对社会财富的积累能力与日俱增，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效率空前提升，那些放着财富不攫取反而停下脚步反思是否破坏自然的人甚至招到了人们的怀疑和嘲笑。人们沉浸在科技进步带来的时代文明中，一厢情愿地推动财富的累积增长，这种情况造成的快餐文化让大量的公众陷入到从众媚俗的享乐主义中。然而，与丰富的物质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人类的精神世界愈发贫瘠，人类生存价值亦无法得到彰显，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寄托之处。思想文化领域的疲软和虚弱，无法抵挡的人的精神与心灵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冲突也愈发明显。各个行业领域的有识之士率先开始反思环境伦理问题。

从“人类中心论”到“生态中心论”是欧洲环境伦理思想的演变过程。随着更多的环境伦理学派对本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入探究，人们希望可以获得环境伦理学的更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和可靠的思想渊源。美国环境伦理思想家对环境认知、阐述和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时间较早，对社会民众投身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改进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方式也让人们愈发认识到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伦理学具有的精神力量，人们由此探索走进自然、回归自然的道路，人类环保意识日益增强，对环保实践有着更清晰的自我意识。在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观当中，环境伦理思想的萌芽深藏其中。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观为基础的超验主义伦理思想作为美国环保伦理思想的基础，对当今环境伦理的研究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是推动环境保护运动的理论动力。

环境伦理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伦理原则、伦理范畴和德行规范的知识体系，是以人与自然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一种价值理论。爱默生认为自然作为人类的生存基础，完全向人类敞开怀抱，不仅提供人类所必须需的一切物质资源，这是自然物用价值的体现。而且人类在自然中可以获取无上的精神价值。只有深入到自然之中，人类才能找到内心的寄托，感受自然的洗涤人心的力量，体验自然之美。爱默生认为自然有多重表达的形式，但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统一于自然的完满与和谐的美的状态。这是环境伦理学中自然价值理论的思想基础。

3.3 对环境保护实践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美国超验主义者倡导人类对自然保持热爱、尊重和保护之情，在确保自然良好存续的同时实现人类自身的持续发展。爱默生作为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和美国环境伦理学的奠基人，其以超验主义自然观为基础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对十九世纪的美国人民以及后世的人们的环境保护实践和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大量的启示。爱默生的作品、演讲到处都在强调自然的重要性，让人们认识到自然的“美”无处不在，万物无一不“美”。他崇敬热爱自然，尊敬自然规律，自然道德规律的神圣性充分展现在他的自然作品中。爱默生让人们的内心认识到自然的和谐美丽，触及事物表象下真实自然的魅力。通过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人类所栖息的物质环境得以保存，人类精神家园的完整亦得到了维护。

受爱默生影响，梭罗直接体验到独自一人独处

自然的体验，实践了爱默生“独享自然”的超验主义伦理学思想，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梭罗关于自然的超验主义思想。梭罗不仅是一位细心的自然观察者，他的深邃的自然思想成为今天环境生态伦理学的重要精神资源。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观思想得到梭罗实践后，也深刻影响美国著名环境保护实践第一人约翰·缪尔。缪尔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荒野体验出发，在爱默生超验主义及其自然观的影响下，将客观自然、神性元素、生态审美与理性科学联系在了一起，孕育出了独特的自然观，并在其作品和环境保护行动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他缪尔在日记和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态写作思想，体现了一种符合现代环境伦理的科学主张。这种表达以文学为载体，既体现了符合现代环境伦理的科学立场，也生动展现了大自然的生命力与内在活力。它将自然提升至具有神性尊严的地位，并以科学般精确、诗意图景的笔触，描绘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诗意图景的理想图景。因其对荒野自然的生动描述，在自然保护和环境伦理学方面的伟大的成就和贡献，缪尔被人们称为“康科德最后的信徒”、“心醉神迷的梭罗”、“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圣人”，赢得了“美国环境保护主义的精神之父”的至高荣誉。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工业文明引发生态危机现象愈发明显，人们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人的欲望不断膨胀，心灵空虚现象不断得到滋长。工业文明的推进与发展向人们展示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然而，人自以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忽略了自己本属于自然的属性，同样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人的一切能动意识都来自于自然赐予，不论是天赋还是技能都源自于自然力的加持。另一方面，人是一种自然感性存在物，与其他动植物同属于自然范畴，必然也受到自然的制约与影响。对工业文明全方位进行反思形成新的生态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观及其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让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诞生和萌芽。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观及其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为生态文明创造了一个发展的空间环境，并从一个超越时代的角度审视了自然给予人的精神价值，使人回归自然，体验自然的真善美。爱默生的思想为美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3.4 对于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建构的启示

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始于国内学者对欧美环境伦理研究成果的译介，因而在其早期阶段不可避免地带有显著的域外理论色彩。其中，美国环境伦理学的影响尤为突出，而基于中国本土实际情况的深入分析则相对不足。最近几年，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成为学术前沿问题，学界对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研究抱有非常积极的态度。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问题需要把握中国环境保护的国情和具体特点，为中国发展面临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即指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应彰显中国特色、形成中国风格、体现中国气派，而非仅停留在对西方著作的译介与学说的依赖上。为实现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长足进步，必须超越以往简单模仿与移植西方理论的研究模式，致力于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与理论根基。

爱默生的环境伦理思想对我国环境伦理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论是哪一种学说还是思想要在现代社会得以延续，都必须通过实践来保持生命力，要想获得新的发展更要与时俱进，能对现实需求起到指引和实践的作用。环境伦理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要让当代人继续发展这项理论，一定要面向生活实际，提供能为社会层面提供解决问题的路径。爱默生环境伦理思想的诞生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现实环境，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社会的差异性。中国要实现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必须考虑到环境保护面临的现实情况。中国要发展现代环境伦理学，就必须对自然规律有正确的认知，能在自然可承受区间对自然进行开发和利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才能保证人的活动不会对自然造成破坏而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一直贯穿着生态主义的理念，对自然本体的重视和理解也非常深刻，这样的历史传统对中国人推行环境伦理道德教化有着重要意义。在中国环境伦理思想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当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着眼于将新时代需要的环境伦理意识植入到公民价值观中，为环境伦理学的中国本土化和超越本土化创建新的空间。

结合中国当代社会问题，我们需要正确界定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模式，在理论层面进一步深入开展环境伦理研究工作，对现代多元化的环境伦理思想进行科学整合，为重构人与自然关系、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不仅应该充分吸纳西方环境伦理思想，更应该保持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遵循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态文明新思想，体现我们应对生态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形成一种与西方环境伦理思想保持交流对话而不完全相同的理论与实践路向，为构建中国环境伦理学体系提供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启示和借鉴^[19]。

4 结论

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观是对浪漫主义自然也想的继承和呼应，是对十九世纪美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批判和启示。爱默生从超验的角度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自然的价值和地位，将人与自然放在平等的地位之上。同时，他主张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分离。因为，一旦自然和人类分离的，处于互不相关的两个不同部分，那么我们就立刻成为了孤立的人，与交往相脱离的人，放弃了自我生存的人。然而，如果我们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我们将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无限利用自然，而是去热爱并崇敬自然。面临着十九世纪已经开始萌芽的消费主义，爱默生倡导人类远离这种使人异化为不完整的人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转而与自然独处，不忘记锤炼身体的体力劳动，时刻与自然相伴，沉浸于自然引起人的精神神性中去，崇敬大自然，体会大自然真正的美，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与大自然在精神上合而为一。爱默生关注自然，将自然阐述为具有多样的价值，倡导人与自然在精神上和谐统一的新关系。在他的超验主义自然观的影响下，爱默生崇尚灵魂，将自然与“超灵”相结合形成了他眼中真正的文学艺术，呼吁人类用自己的心灵去感知自然，去发现崭新的自我从而完善自我的德性。在他呼吁要崇敬自然、热爱自然的基础上形成了要引领美国人民去实践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并在与自然的独处中去提升个人的神性以达到个体完善。在他超验主义自然观蕴含着的超验主义伦理思想统领下的这些观点对于他同时代的人们以及后代的思想家们影响极大。爱默生在演讲与著述中呈现的环境伦理思想，对后世该领域的诸多重要学者产生了显著的启示作用。许多已臻成熟的相关理论，无论是关于自然的价值，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均可在爱默生的论述中发现相应的思想渊源。其超验主义自然观及其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

历经深入考察，愈能彰显跨越时代的深刻意义与持久的精神价值，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处历史阶段的局限。作为对美国本土文化形成具有深远影响的代表人物，爱默生堪称美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先贤。在当代社会面临生存与发展困境的背景下，对其环境伦理思想展开研究，能够为人类探寻精神家园、实现与自然和谐共处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亦使其智慧在当代继续滋养人类的心灵。

参考文献

- [1] DR. H. Gabriel. (1949) “Emerson and Thoreau” in The Transcendentalist Revolt Against Materialism. by George F. Whicher[M].Boston: Heath, pp.64.
- [2] 路强.环境伦理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J].社会科学辑刊,2015(2):12.
- [3] 陆杰荣. 形而上学的当代构建及其现实意义[J].哲学研究,2007(9):74.
- [4] 陆杰荣. 形而上学的当代构建及其现实意义[J].哲学研究,2007(9):74.
- [5]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6]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7] 洪丽. 西方环境伦理的哲学视域与道德重建.哲学研究,2022(3):12.
- [8] 洪丽. 西方环境伦理的哲学视域与道德重建.哲学研究,2022(3):12.
- [9] 李培超,彭立威:承接与拓展:西方哲学的转向与环境伦理思潮的崛起[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07(1):43-45.
- [10] [美]大卫·格里芬著;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11] 苏贤贵:梭罗的自然思想及其生态伦理意蕴 [J].北京大学学报,2002(2):60.
- [12] 苏贤贵:梭罗的自然思想及其生态伦理意蕴 [J].北京大学学报,2002(2):60.
- [13] Philip Cafaro. (2004)Thoreau’s Living Ethics: Walden and the Pursuit of Virtue (2004)[M]. Athens and London: The

-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p.139.
- [14] 洪丽. 西方环境伦理的哲学视域与道德重建. 哲学研究,2022(3):16.
- [15] 杨通进:走向深层的环保[M].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16]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 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 [17] 陆杰荣,洪丽. 爱默生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问题与伦理思想解读[J]. 辽宁大学学报,2024(4):74.
- [18] [美]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 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 [19] 洪丽. 西方环境伦理的哲学视域与道德重建[J]. 辽宁大学学报,2022(3):18.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